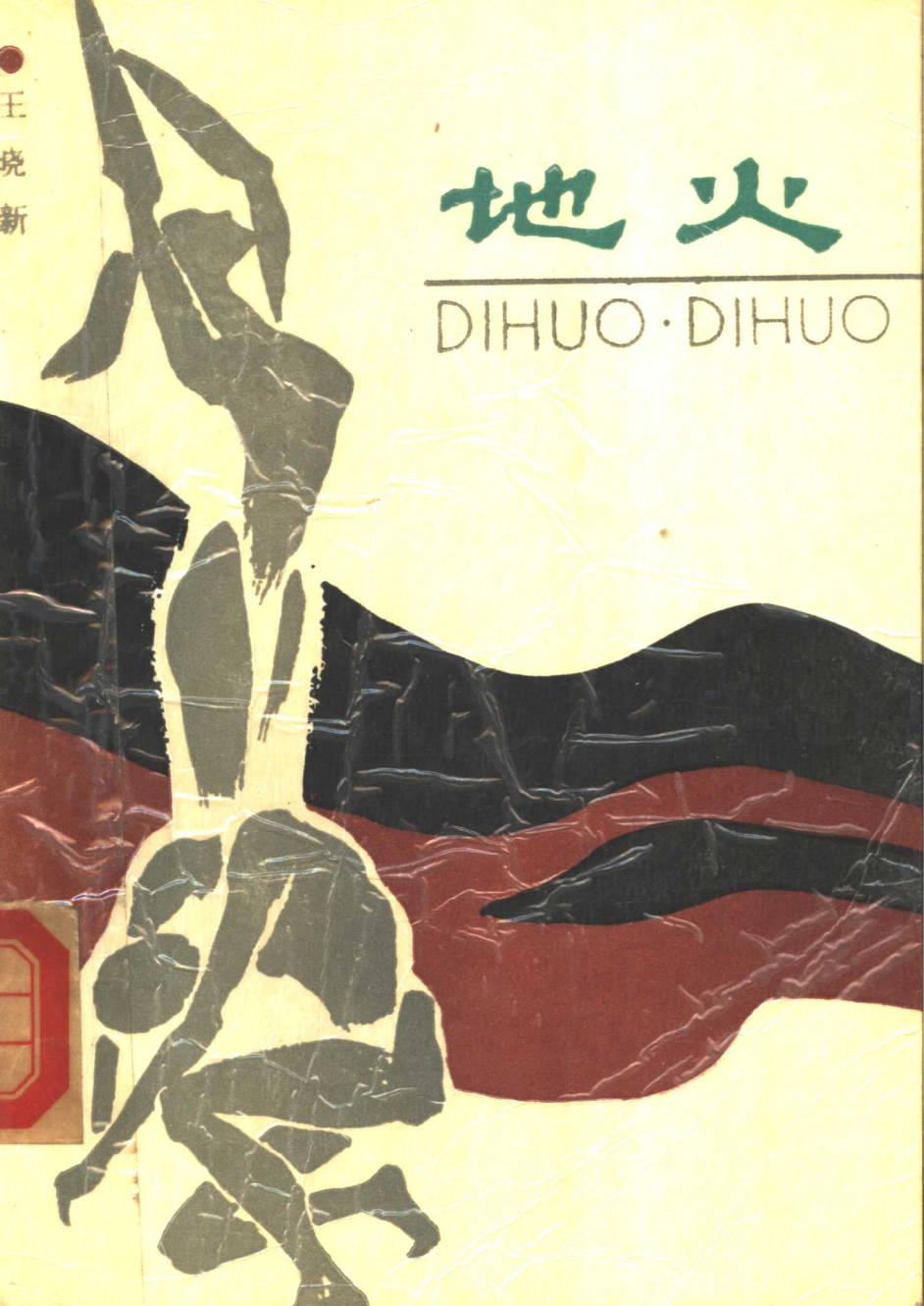


● 王
晓
新

地火

DIHUO · DIHUO



地 火

王晓新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北京西什库茅盾胡同甲3号）

兰州七二一九工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印张12.875·插页1·字数277,000

1989年8月第1版·1989年8月兰州第1次印刷

印数0,001—6,100

ISBN 7-5033-0080-9/I·71

定价：4.65元（膜）

第一章

一

在离秦桥镇很远很远的地方，我看见了两个女人的影子。一个是我的母亲，另一个是一位十七岁的少女。她们好象刚从一个冥冥的遥远的世界里走出来，特意迎接我这个突然回归的“浪人”。

我的母亲早就死了，迎接我的也许是她的魂灵吧？而那位十七岁的少女肯定还活着，不过已经不是十七岁了。二十年的风风雨雨，为什么丝毫没有冲刷掉她那独特的青春气息，依然给我以透骨铭心般的温柔感觉？

我迎着她们急切地走去。虽然我的脚步不时出现醉汉般的踉跄，但我全身却充满了沉重而亢奋的活力。

二

我的儿子小马驹对于回归故里麻木不仁，正伏在自行车的车头上呼呼酣睡。

我靠近了久违的家乡。

村边没有人迎接我，刚刚出现的只是美妙的幻影。家乡上空朦胧的光亮象神圣的光环一样美丽迷人，使我两眼湿

润，心里发热。

然而，我却不知怎样度过这回乡的第一个夜晚。

三

对于其他人来说，这也许是一个极普通极平常的夜晚。而我要充分地认识这个夜晚，却需要穿过厚厚的历史雾幔，敲透并不坚固的冰层。否则，我不能高枕无忧地安然入寝。

在这个世界上，大概只有我和我父亲能够深切地感受到这个冬夜的奥秘。

我象置身于一个扑朔迷离的梦境里。

寝室后面，耸立着一座高高的炮楼——实际上应该叫“枪楼”，因为里面根本无法放置一门哪怕是最小的火炮。

这是我们秦姓家族保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为完整的建筑遗迹。

炮楼下面，是一座古式建筑，飞檐翘拱，显得凝重而奇伟，但却给人以头重脚轻的感觉。我仔细观察了一下，这不是建筑本身的毛病，而是那大方的新式窗棂和拆换过的薄砖山墙造成的视觉危机。

屋内的墙壁用漆料粉刷一新，还勾出一层墙裙，古朴中又增添了几分雅致。仰头看去，让人简直不能相信临顶的是复杂的砖木结构，因为上面镶满了具有华贵气息的塑料天花板。

这就是我住宿、办公的地方。现代装饰材料和古老的建筑格局，给我提供了一个既舒适又安全的环境。

然而，办公室和寝室内的许多摆设却很不协调，给人一

种因陋就简同时也是因地制宜的凑合感觉。好在我并不讲究。我能理解为了给我安排这样一个处所，乡政府的总务人员一定是煞费苦心，不惜破费有限的地方财力。

最不称心的是我办公用的写字台，长度有余，而宽度不足，象一张旧时的供桌改制而成。

写字台旁边，放置着两个怪模怪样但却透出极强的时髦气息的沙发。这种沙发棱角浑圆沉实，有着非常分明的缝合部，象一个浑然一体厚重无比的铸造物。据说这是刚从中国西部省分陕西兴起的、名为“里根沙发”的起居家具。

寝室通往外间的门是新式单扇门，上面嵌着一把三保险的弹簧锁；而外间通往院子的门却是双扇雕花门，大概属于原有的建筑格局。

从刚刚走入这个处所的那一刻起，我就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我敢说，除了我和我的父亲，世界上任何人都不可能有这种感觉。因为这里的一切与我的家族和家史有关。

那种关系呈现出的是非常复杂而微妙的社会形态。我的感情也不可避免地随之而复杂化，微妙得难以言喻。

必须尽快地将这种情感梳理清楚，否则我将无法很好地履行我应尽的职责和义务，或者叫历史使命。

从今天夜里起，我已经是秦桥镇的镇长了。

这只是一个芥菜籽一般的小官，因为县团级才是芝麻官儿。问题不在职务的大小，对于这个“芥菜籽”我已经受宠若惊，哪敢再有更高的奢望？有些事儿在我还没施政之前必须很好地想想，想想！

走出套间的新式单扇门，继而走出双扇的雕花格子门，我来到镇政府的院子里。

疏朗的星斗在高远深邃的夜空里瑟缩颤栗，一抹暗灰色的夜云在轻缓地移动。

我弄不明白，是历史老人突然失去了记忆，还是历史作出的着意安排，我居然会上秦桥镇的镇长！四十年前，也就是一九四四年的那个冬天，我的父亲也受命担当同样的职务，同时他还兼任秦桥镇的商会会长。我们父子俩都是在不同的历史急遽变革时期登上秦桥镇的政治舞台的。

这显然是一种历史的巧合。历史上也不乏这样的巧合。但巧合的结局不外乎两种——悲剧和喜剧。

我父亲所落得的是悲剧性的结局，而且是历史性的悲剧。此种性质的悲剧比其它任何悲剧还要惨重而深刻，不可抗拒也不能抵御。

为那个并不显赫的职务，当然也包括父亲昭著的罪恶，我们的家族接受了从未有过的历史惩罚，付出的代价巨大而惨重。父亲头上那顶芥菜籽大小的王冠被革命的狂飚轻而易举地刮落了，我家的二百多亩土地和一个大商号在一个早晨便荡然无存，落入寻常百姓家。

我父亲换上了另一顶帽子——地主兼资本家再兼历史反革命。这种惩罚不带任何冤假错的成分，我父亲的确罪恶昭著。他曾经用商会所属的几条枪，利用眼前的这座炮楼，顽固地阻挡过一个新世界的诞生。仅仅这一条，没有被枪崩，已算万幸。

实际上，我们失去的是整个秦桥镇。因为镇子街面上的房屋几乎全部属于我家所有，就连这镇政府的地盘也原属我家，是有名的秦家祠堂，后来的镇公所也设在这里，同时也是商会所在地。这座炮楼就是商会保卫本镇商户的建筑物，

枪支是我家和其他商户集资购买的。

我们秦姓家族，特别是我们家庭付出的精神上的代价更为长久惨重。我十六岁那年，母亲在忧病煎熬中溘然长逝，姐姐因婚姻屡遭挫折导致轻微的精神失常，最后招赘了一个山民当上门女婿，后来又用她哭笑无常的疯癫吓跑了那个山民。

我呢？虽然只在人世度过了三十六个春秋，但所遭遇的坎坷磨难的次数远远超过了年龄所显示的数目字。三十岁的时候就成了一个男寡妇（当地人都这么称呼离异后带小孩的男人）。我成了中国的克莱默。

今天晚上，我就是带着那个小孩，带着共产党的嘱托和信任，来走马上任的。

早在几天之前，我的书籍和家具已被镇政府的汽车捎了回来。今天夜里十点多钟，我和八岁的儿子悄悄地回来了。

之所以选择夜间回秦桥镇，我是有一番良苦用心的。如果大白天走入家乡小镇，我不知道用怎样的表情和喧然谦语应酬乡亲和族中人。

我怕自己流眼泪。

我怕自己晕倒在街头。

我承认我是一个刚强的男子汉，从少年时代起就几乎与泪水绝缘。然而我保证不了干涸的涝池会突然裂开泉眼，冒出汹涌的地下水来。

完全有这种可能。

我丢失在这块土地上的东西太多了，童年时代的美梦和少年时代的羞辱，其中也包括我最难忘怀的初恋，带着苦涩味的初恋，都丢了，丢了……

我记得清清楚楚，走出这个庭院，在大门外东侧的墙角处，我，一个十六岁的少年，第一次接受了一个姑娘的馈赠和爱抚。她比我大一岁，却好象比我早成熟十年。她那双粗糙然而壮美的手留给我的记忆永远带着温馨和深情，虽然当时那双手带着一股蒿草味和柴烟味。后来我才细细地咀嚼过，玩味过，她大概是在烧罢家里的火炕以后，才匆匆地跑出来和我约会的。其时，我是一个刚刚失去母亲的少年，是一只可怜的丧家而又落水的小狗。

现在想来真有点危险，她居然选择了那样的约会地点。那地方几乎无遮无拦，随时会被一个过路者收入视野。幸亏当时没有人发现，除了天地鬼神以及我和她，世界上谁也不知道那里曾经遭到过一对男女少年胆大包天的亵渎。

会儿，我要去看看那个地方。

女子比男子早熟，这是生理学家告诉我们的。当时我茫然不知所措，她却象个大姐姐似的把我冰冷的双手拉过去，夹在她的胳肢窝里，替我暖着。我既不敢前进半步，也不敢朝后缩退，象个木偶人似地站立着。扑面而来的除了热切的絮语，还有一股很浓的蒜苗气味。时值冬天，加之困难年月，农家唯一的下饭菜就是蒜苗拌辣子醋水。当然，这也是一种生活习惯，至今家乡人仍然吃这种菜食，连增添一点酱油的习惯也没有。然而在当时，那股非常贴近的蒜苗味却是那么热乎好闻，令我陶醉。就象第一次喝烈性酒，我几乎要晕倒在地。

那天夜里，我们始终没有超越双手接触的界限。并非我们各自有着很强的自制能力，有意识地用理性的大堤约束着

感情的初潮。那时候，我们的心境太复杂了，复杂得使我们还没有成熟的灵魂和已经成熟的肉体处于纯真的矛盾之中，从而遏止了种种本能的爆发。

我由于精神的过度紧张和感情的过度激动，以及肉体的盲目骚乱，再加上数九寒天夜风无情地侵袭，鼻子象失去机能控制似的，每隔几秒钟就吸溜一下，鼻涕老是往外溢流，令人讨厌却又无法控制。

她不时伸过手捏捏我的鼻孔，然后在擦襟上抹抹或者往地上一甩，再往她的衣襟上抹抹。她不厌其烦，不嫌肮脏。

现在想来，她不象我的小情人，反而象一位乡间纯朴的母亲，象一位过早挑起生活重担的姐姐。

于是，我更真切地闻到了她嘴里喷出的蒜苗气息，闻到了她手上的蒿草味和柴烟味。那真是世界上最美的气味！

我们就要分手了。我要离开老屋投奔舅舅家。她就要告别学校，去当农家少女。

对于我和她来说，都是痛苦的告别。

我弄不清她为什么会爱上我这个狗崽子。记得那天夜里我就问过她。

“秋芳姐姐，我的好姐姐，你知道我家我爸……”

“知道知道，你把姐姐当成了傻瓜。”

“知道你还对我好？”

“……”

“你不怕跟我好，会背黑锅的？”

“……”

她也说不清。但我可以感受到她怕因为这些阻隔失去我，把我的手夹得更紧了，而且把我朝她怀里拽了拽，几乎

要拥抱在一起了。

她父亲过去是我家的长工，并且累死在我家的土地里。我不理解她的感情怎么会超越天堑般的鸿沟，胆大包天地朝我靠拢。

那天夜里分手时，她送给我一个小布包，说等我离开秦桥镇以后再解开看。

四

笃笃笃笃……前院里传来节奏感极强而又非常紧密的脚步声。是一个女人在走动。

脚步声——特别是女性的脚步声，最能体现出一个人的气质。这个就要出现的女性一定带着女性特有的矜持和高傲，没有丝毫的俗气和矫揉造作。

我的判断是准确的。一个姑娘边走边撇肘作深呼吸，好象刚刚进行过一场艰辛的脑力劳动。在县城里我就听人说过，镇政府有一位经济学院毕业的女学生，不愿留在城里，主动要求来这沿山的小镇工作，分管镇上的企业。

大概就是眼前的这个姑娘吧？

她发现了我，立即停止了深呼吸活动，静静地注视了一会，然后大声问道：“你是秦镇长吧？怎么偷偷地走马上任？也不打个招呼，我们好给你接风。”

“这么晚了，你还没有休息？”我用关切的询问巧妙地回答了，我就是镇长。

“我在写乡镇企业的计划报告，准备向你汇报呢！”她的声音很甜，还带着几分稚气。“没想到你走马上任这么

快，昨天镇上才接到组织部的任命文件，你今天晚上就出现在院子里。”

她背对着灯光，从那黑幢幢的剪影般的轮廓看，她体态优雅，很有点气质。

想不到镇政府有这么一个漂亮姑娘。低级趣味的思绪在一瞬间出现了——一个单位有那么一两位漂亮娘们儿，总使人感到愉悦爽心。人是点缀环境的最理想的东西。我屋里那对里根式沙发和八十年代的天花板算得了什么！

“听说你还带着个小娃？”她朝前挪动了几步，漫不经心地问。

我点了点头。这是我最感伤心的话题，不愿作任何说明和回答。

“在西德和美国，这样的父子家庭与日俱增，许多议员和博士都采用这种生活方式。在中国，你倒先走了一步。”

她居然开起了带讽刺意味的国际玩笑。我有些恼火。我不知怎样回敬她，只好保持沉默。

她忽然笑了起来。朗朗的笑声象一串银铃似的抛撒开来，在镇政府的院子里滚动，抛向深邃的苍穹，似乎四处都响起了她的笑声。

象一股温馨的清泉突然奔涌而来，滋润着刚刚被怒火点燃的心田，火气在一瞬间被浇熄了，连那往日积郁在心底的阴云也一并驱散，亮出了一片明朗的天地。恼火化为感激，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最让我吃惊的是，她的笑声无意中猛烈地撞击了我心中那根情爱的琴弦。那本来是一根就要生锈的破弦，现在却急着要奏出一点乐章。我的手脚在黑暗中有点慌乱，想立即逃回宿舍，然而，似乎又舍不得离去。

我又平添了一股莫名的愁绪。

我也跟着干笑了几声。我想用强装出的会意的笑岔开那杂乱的无端的乐章，恢复一个镇长应有的常态。然而一个顽固而又显然有点低级的念头却死死地纠缠着我：应该和这个漂亮娘儿多聊聊。

“到我宿舍里坐会儿，好吗？”

她天真无邪的邀请正合我的心意。

“冬夜太漫长，反正也睡不着觉。”

我本来已经起步跟她走了，听到这悦耳的漫不经心的喟叹，心里怪不是滋味。别看她笑得那么开心舒朗，在这穷乡僻壤也多多少少怀着几分寂寞，几分苍凉。

当我走进她温暖的小屋时，一股淡淡的香味强烈地朝鼻子里刺来。深夜里，女人的香味特别诱人。我有点不自在，不舒服，甚至想立即退出去。就象当年闻到秋芳手上的柴烟味和蒿草味一样，显得有点拘谨慌张。

我刚刚坐到她那窄小整洁的床上，她就把桌上正写着的汇报材料拨向一边。很显然，她不想把话题引向工作，而想谈点别的什么。

我忽然发现她桌上放置着的系列化妆品，已经落了一层厚厚的灰尘。这些最时髦的东西在灰尘的掩映下简直象古怪的出土文物，特别是那个高脚异形的花露水瓶子，活象从唐墓中刨出来的陶甬公主，骄傲典雅而又土气笨拙。

我苦涩地笑笑。

她无可奈何地耸了耸修美的肩膀。

我知道，乡间飞扬的黄尘和平时跑基层所出的汗水是这些化妆品无情的天然大敌，弄不好会弄得她人不人鬼不鬼

的。而那象裤带一样伟长的面条、锅盖一样厚重的大饼，简直让口红无法在此地容身。

我惨然地摇了摇头，问道：“学经济学专业的，大都留在上面的研究机关，你怎么想起往这儿跑？”

她拿起那象唐代公主似的花露水瓶子，使劲晃动了几下，屋子里又增添了一点香味。

“的确是这样，研究农村经济的很少有长期泡在基层的，即便下来，也是蜻蜓点水，搞点调查，写篇论文，就走了。要么拿着论文去得奖，要么拿去发表，为获得什么硕士、博士学位捞点资本。很少有人了解一个全过程，一环不漏地把握住每一个进程。”

我问她：“你想和农民同步跑完一个赛程，跑到终点？跑到都富起来的时候？”

她漫不经心地说：“试试看呗，已经起步了。”

我提醒她：“这可是个漫长而艰难的历程，三年五年是跑不到头的，要真跑出点名堂，非出几身热汗不可，还得把美好的青春埋进土里。”

她忽然转而问我：“你呢？你为什么也往这儿跑？在体制改革委员会工作不是挺得意，挺舒服吗？”

该怎么回答她呢？我的动机、心理、情绪，比她单纯的想法复杂一百倍。

沉默得难以忍受时，我无聊地把一盘磁带塞进了她桌上的收录机。

《北国之春》悠缓但却亢然的前奏曲象突然从石缝中飞出的泉水，从那个黑色的外壳里往外迸溅水花，流泄出初春黎明的晨曦。

我心里象开了锅的水，翻搅不已，滚烫难忍。我突然从床头站起来走向远的地方。

我很喜欢这首歌。对于其它日货我感情淡漠，唯独对这件日货“软件”怀着极浓的兴趣。不仅仅因为我的家乡也在北方，我离开家乡又许多年了，也不仅仅因为我的家乡也有皑皑白雪、亭亭白桦，也有曾经爱恋过的姑娘，只是由于那撩人乡思、拨人心弦的曲调太富有感染力了。我不太喜欢蒋大为那过于明亮高昂的音调，更喜欢含着流浪意味的吟唱。据说它本身就是描摹流浪汉心境的歌曲。而我回到秦桥镇既是游子回归，也是浪迹还乡；既带着小小的光环，也肩负着历史的使命；既有悲，也有喜；既有投入大海的亢奋，也有沉浮难料的隐忧。

姑娘，你这个单纯的姑娘，该怎么对你说出我的乱纷纷的心绪呢？

也许是由于她过于专注地等待着我回答，唐公主似的花露水瓶从她手中滑落，摔碎了。浓烈的香味在温暖的小屋里迅速弥漫开来，刺得我头晕目眩。这时我的另一根神经却无比坚决地指示我、提醒我：快回你屋里去！小马驹初来乍到，也别从床上掉下来摔碎了。

我回屋去了。

当夜风把香水的余味完全驱散之后，我再一次清醒地思忖，到这儿来任职也许是命运的驱使，命运的安排。

前不久，县委和县政府要动员一批中青年干部到乡镇任职，我理所当然地报了名。我想到别的山区乡镇去。尽管我非常怀念我的家乡，但作为党培养出的一名基层干部，还是避点嫌好。

县委书记、县长，还有组织部长把我叫去了。他们首先开诚布公地声明，这次往下边派干部，一般都提前征求个人的意见，象搞承包似的，让任职者提前有个思想准备，也允许有点想法，增加一点公开性和透明度。

我被组织上这种周密而开明的做法折服了。

县委书记问我：“你想到哪个乡镇去？”

我反问他：“你觉得我去哪儿合适？”

县长笑起来：“好几个乡镇你也许愿意去，但其他几个干部先报了名，而且谈了他们治理的想法，唯独你的老家秦桥镇至今还没有人敢站出来揭榜。”

“为什么？”

话一出口，我自己也感到问得多余。我知道，有不少人都怀着某种程度的去乡镇镀点金的目的，然后象闪闪发光的真金子一样，用来和组织讨价还价，让上级给一个装真金的盒子——在某个有权有势的单位谋个要职；另外，可怕的历史辙印还清晰地印在秦桥镇的土地上：几任书记把命赔在了这里，还有几任吃了败仗，落荒而走；当然也有人说我的家乡民性刁劣，喜欢告黑状（据说这是写在县志上的），不大好管理。

我承认我的家乡并不那么美好，但也不允许人们把她看成魔瘴般的地方。我的脸红了，耳朵象起了火似地发热，火从耳梢上冒出来，整个头发也象要燃烧起来。人们瞧不起我的家乡，使我感到愤怒。

县委书记似乎完全理解我的心情，拍拍我的肩头说：“我们只是从全局考虑，才想派你到秦桥镇去的。当然，我们首先得尊重你本人的选择。”

组织部长立即亮了旨意：“你干脆到秦桥镇去，先干一

段时间再说。如果不行，我们可以调整。”

县委书记又说话了：“我知道你在家乡吃过不少苦头，受过许多委屈。但不能计较这些，尽量淡化矛盾，淡化过去，淡化冤仇，带着大家往前看，往前奔。”

我在心里琢磨着他的几个“淡化”。一个多么机智而时髦的词儿。

县长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当然，回秦桥镇对你个人也有点好处，家里人可以替你照管孩子，你会省心一些，说不定还能找个好媳妇。”

我既想笑，也想哭。他哪里知道，我母亲早死了，姐姐又患有精神病，鬼来给我照料小马驹！

县委书记也跟着开了几句玩笑，接着非常严肃地告诉我：“我们希望你尽快把秦桥镇的经济搞活，搞出成效！打破目前不景气的局面。据我们了解，秦桥镇解放前是本县一个比较繁华的镇子，而现在却是本县经济发展最缓慢的角落。我查过一个资料，解放前秦桥镇上缴的税款是相当可观的。”

我不知怎样回答上级的嘱托，脑子里盘旋着另外的念头。解放前谁在秦桥镇执政？是我父亲。他既是镇长，又是商会会长。

县委书记好象看出了我的心思，直言不讳地说：“为了搞活经济，你父亲过去用过的行之有效的办法，咱们也可以尝试着用嘛。”为了使这个大胆而特殊的指示从理论和政策上站住脚，他又加了几句，“已经有了这样的先例，四川一家航运公司就是大胆地让资本家的后代站出来恢复过去颇有信誉声望的船队，我记得那个船队叫什么来……”

县长补充说：“叫民生公司。”

“对！叫民生公司。”县委书记拍了拍脑袋，接着又从理论上进行了阐发，“当然，我们是无产阶级，不能笼统地讲向其它阶级学习，但是无产阶级的成就并不是孤立发展而来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吸收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一些合理的成分……”

我没有再说什么。既没有提出什么条件，也没有提出下去的期限。一种更加复杂、博大、深广的思乡情绪象洪水猛兽似的把我吞没了。不等他们召开常委会并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认可，不等他们草拟文件，我就开始打点行装，时刻准备离开县城。

小马驹问我：“爸爸，咱们搬到哪儿去？”

“回老家。”

“什么叫老家，老家是象老头一样的家吗？长胡子的家吗？”

我从来没有向小马驹提及过老家。“老家”本来是个撩人情思的字眼，然而对我来说却充满着伤情的记忆。我怕他幼小的心灵接受不了，容纳不下，所以从未提起过。现在不得不向他绘声绘色地描述老家了。我把那里描绘成了一片乐园，一个非常迷人的地方。可是，当我提出回老家后让爷爷和姑妈照管他时，他却坚决不回老屋。他几次问我：爷爷现在到底是坏人还是好人？姑妈是怎么得的精神病？

我对他的诘问不能作出确切的回答。说他祖父过去是坏人，现在是好人，似乎太简单；说他祖父过去是坏人，现在仍然是坏人，显然不够实际，也不符合政策，说祖父不好不坏吧，马驹不会接受这种折衷的答案。电影和电视以及小画